

东西问·人物 | 葛兆光： 我们坐在历史的门槛上(下)

了大西洋的美洲。那么，我们把这些不同视角出发的全球图景，合在一起，不就全面了吗？第三，我说的“从中国出发”，也考虑到中国人接受历史叙述的时候，往往对中国熟悉的事情有亲切感，也比较容易理解。所以，我们会从一些中国历史故事开始讲全球史。比如讲“白银时代”，白银的开采和交易，在十五世纪以后，这是涉及美洲、欧洲和亚洲的大事情，可是我们从明代后期用白银当做货币造成白银紧缺，以及最近中国考古新发现“江口沉银”，也就是明末农民军失败的时候，把大批银子沉在江底这个故事说起，这样就容易引起中国受众的亲切感，有助于他们理解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2007年开始，你提

出“从周边看中国”，但截至目前，我们所看到的“周边”仍在所谓的“东亚文化圈”内。这个“周边”是否还应该涉及中国的北边、南边和西边？如果应该的话，通过它们的“看”与通过东亚的“看”又会有什么不同？

葛兆光：我同意你说的，过去我提倡“从周边看中国”，主要仍然局限在东亚文化圈。原因主要是两方面：一方面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有限，东亚各种汉文文献我们比较容易获取和解读，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；另一方面确实是，过去和中国打交道，这部分区域比较多，特别是文献留存最多的明清时代。最近，我把十年来讲“亚洲史的研究方法”讲义整理出来了，也在浙

大、山大(山东大学)、澳门大学和华侨大学讲了几次“东部亚洲海域史”的研究问题，我就是希望，除了注意中古时期重要的从东向西，族群、文化、冲突的历史联系，也要注意研究近世从北向南，即东海南海的历史联系。特别是，呼吁超越过去的中国中心，也超越过去习惯的以中国为中心的“东亚”，还要超越日本学者近年来提倡的“欧亚/东部欧亚”的研究方法。最好把环东海、南海海域各国都连在一起，并且用他们的眼光、他们的文献、他们的立场，来反观互相联系的历史。这是我近来在努力的方向，只是我年纪太大了，知识也不够，只是努力推一推，希望年青一代学者能多做这方面的研究。

其实，东西南

北环中国各种族群与国家，对中国各有看法。我们不必强求人家对我们怎么看，可是，他们的看法恰恰是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。以前我一直打这个比方，说没有镜子，你只能自我想象；只有一面镜子，你只能从正面看自己；有两面镜子，可以看自己的正面反面；可是当你有了多面镜子，前后左右照，你才能得到立体的、全方位的、细致的自我认知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
除了疫情所产生的影响，近年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诸如右翼崛起等一系列变化。世界秩序是否真的又到了一个巨变的节点？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处和共处的选择？

葛兆光：世界秩序是不是到了巨变的节点，这个问题太

大，我不敢说。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，让思想世界越来越乱，我们不可能回到“心也简单，人也简单”那种道理不言自明的时代。我总隐隐约约觉得，我们现在好像坐在历史门槛上。

虽然我算是历史学者，曾在背后的大门里头，看到过长长的历史和我们走过的路，也明白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门口，当然应该向大门外面继续走下去。但困惑的是，思想与现实乱了。你看，最近一年里，俄乌冲突、全球疫情，它引起的种种变化，是不是有点儿出人意料？其中，让思想产生混乱的，就有那些右翼崛起、帝国观念复活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等。你看，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、冷战结束后的文明冲突、现代新帝国通过科技、市场、资源的另一种形式的冲突，这些又再转回来形成不同制度与价值观的冲突，你不觉得，好像又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吗？

就是在这种时代，我觉得坐在历史门槛上的我们，恰恰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。同时，过去的历史经验、历史记忆、历史教训都推着我們，让我们坚定地向前走，告诉我们，应当相信简明而清晰的理性。(完)



厦门市区的骑楼老街里人流如潮。厦门是闽南骑楼的发祥地，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印记。张斌 摄



2017年4月13日，民众围观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出的文物。刘忠俊 摄